

遊走於七層徙置區的老外

——狄和詩神父 (Fr. Pierre Devos, CICM)

- 1941 年 出生於比利時
- 1966 年 晉鐸、在英國倫敦學習英語
- 1968 年 到達香港、在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
- 1970 年 在聖雅各伯堂當代理本堂兩個月後，先後服務紅磡聖母堂及油麻地聖保祿堂
- 1971 年 調任聖雅各伯堂助理司鐸，翌年升任主任司鐸
- 1976 年 任坑口聖雲先堂主任司鐸
- 1977 年 任聖愛德華堂主任司鐸（至 1983 年）
- 1996 年 回到聖雅各伯堂任主任司鐸
- 2010 年 任聖若翰堂助理司鐸



（圖：狄神父晉鐸金禧。圖片來源：天主教聖若翰堂 Facebook 專頁，攝於 2016 年 8 月 7 日）

訪問：陳樂信、黃奕清

撰文：陳樂信

聽狄和詩神父說他的故事，感覺就像跟著他回到七十年代的香港，遊走於東九龍一帶的七層大廈徙置區之間。獲派來香港傳教，是狄神父當初意想不到的事；在比利時修院與一位來華會士的相遇，把原以為自己只能到非洲傳教的他，帶來到這個東方社會。而在香港服務期間，與一位聖母無原罪傳教女修會修女的相遇，又把他帶進校園牧民的世界。

決心到外方傳教

狄神父生於比利時，在農場長大，中學畢業便加入聖母聖心會修道；他選擇外方傳教會，是因為覺得當本地神職人員不夠挑戰性。

他們（本地神父）的生活似乎很安定；去外方傳教，雖然並非很認識，不是很了解，不過就似乎比較吸引。加入的修會——聖母聖心會，在本地來說，是全部都會去外方傳教的，肯定會離開自己的鄉下。

入初學院一年，然後哲學兩年，神學四年，讀完神學第四年就會立刻離開的。本來，我語言是「麻麻地」。哲學時已經有分開兩個語言：法文和英文，因為會離開本地，本地是講荷蘭話。升讀神學的時候，我們有兩間修院，一間是用英文，另一間用法文；我申請去法文的，心裡想讀法文就去非洲，去剛果，因為是我們比利時的殖民地。

實現到中國傳教的初衷

在神學最後一年級時，狄神父遇上在台灣和香港傳教、剛好回比利時休息的會士，這成為他最終獲派來香港的關鍵，亦實現了他加入聖母聖心會的初衷。

因為我們的修會是為中國而創立的，我們早期所有神父都是去中國傳教的，中國的北部，即內蒙古。不過解放

後，大陸的神父都要走。在五零年代，1958年開始，有些神父從大陸出來，經過香港，有些神父見到香港有些北方人，便想留在這裡。當時本地香港教區是不允許的，所有從大陸出來的神父，他們全部都是經過香港離開中國，但是教區的政策說，不可以讓他們留在這裡，不知道是否怕有太多。

我們有一、兩個神父，很「硬頸」¹的，沒有離開，留在這裡幫助那些來自北方的教友，在調景嶺及紅磡這兩個堂區。在這兩個地方，我們有些神父留下來，因為他們都是服務，特別是服務從北方來的教友，教區都慢慢接受。

我是七零年代的。那位神父回來放假，說需要接班人，因為那批神父都開始年紀大，要找較年輕的神父。他問我：「你有沒有興趣去香港？」我答他：「有，不過修會不准許的。我學法文，多數是去非洲的。」那神父說：「可以的，我會幫你安排。」他真的，讓我畢業的時候，修會決定派我來香港。這其實都是我入修會時的一個期望，因為我剛才說，我們的修會當初都是為中國的。

我讀初中的時候，即是51、52年，那些（被趕離中國的）神父回來，會先回家。他們回比利時的時候，因為我們是天主教國家，所有學校都是天主教學校，他們便會到中學做分享，分享他們的經驗。

他們大家都坐過監，回來休養，因為坐監，都很瘦。他們到學校分享時都說，是暫時性的，很快的，共產黨會

¹ 廣東俗語，固執、堅持的意思。

「祿」²，我們很快就會回去。他們到處去講，使那時候的我，心裡想如果是神父，去外方傳教，覺得去中國好，於是有個心願，他日我都要去中國。不過，入修會的時候讀法文，就去非洲。但到最後，天主的安排，讓我來香港。

既然我這麼多年都是讀法文，會長便說：「好吧，你去香港，你都要懂英文的。」我們都會學英文，中學都有，不過就好像香港人的英文般；於是讓我去倫敦讀一年英文。

我們修會在倫敦有個堂區，我學英文時便在那個堂區服務。誰知在那個堂區我都是年輕的，那堂區的神父都是以前在中國傳教的，都是年紀較大的，我是「後生仔」。本來他們想我留下來，但香港的會長說：「不行，你一定要來香港」。於是，1968年來到了香港。

輕輕的文化衝擊

狄神父來到時，香港已經是一個城市。他在倫敦除了讀英文，也有點牧民經驗，讓他習慣城市的生活，所以來港後亦適應得很快。他覺得這兩個城市的生活有很多相似之處，而不同的，主要是飲食和待人接物的文化。

我來到香港去到聖母堂，他們不給刀叉的，被迫要用筷子，頭兩個星期，隻手真的抽筋，隻手是很累的。不過我很感謝，兩個星期之後，可以用筷子食飯。

去飲茶，食雞腳，人家食，我也食。不過，我都說我是在農場長大的，我們不會食雞腳，頭和腳是會丟掉的，

² 崩潰、倒台的意思。

但是食豬時，就甚麼都吃。來到香港，人們覺得是可以吃的就吃。

初初只有一樣東西是很怕的，就是皮蛋。因為是黑色的，對我們來說，一隻這樣子的雞蛋，就是變壞了。我望都不敢望，我好怕皮蛋。後來都會吃。

食物不同，可以嘗試，也可以避免；語言不同，可以去上課。傳教一定要跟本地人溝通和合作，生活習慣與文化的不同，需要用心認識和體會。

我們都說「東方的心」，或者是「中國人的心」，是很難認識、很難了解的，因為中國人不會直接告訴你在想甚麼。他會用一些說話，你自己要思考，原來是想講甚麼。西方人不是這樣的，會直接跟你說，但中國人不會直接答你。我想當時更加明顯，現在改變了，不同了。當時是這樣，是很神妙的。

徙置區一帶的傳教生活

狄神父在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，1970年5月完成課程後，曾在油塘聖雅各伯堂當代理本堂兩個月，然後出任紅磡聖母堂的助理司鐸。

一畢業，講得「麻麻地」，聽都可以，寫就更加不可以。但剛剛有位神父，在油塘，他是當本堂的，要離開兩個月，他要去菲律賓。我剛剛學廣東話畢業，便派我去油塘，做代理本堂兩個月，只有自己一個人，是一個好新的經驗。

當時的油塘是徙置區，即是一些七層大廈。我們在第四座有間幼稚園，在地下的，我也住在幼稚園裡，有一位

伯伯負責清潔和煮飯。就在那裡兩個月，神父回來後，我就返回紅磡聖母堂，做副本堂。

當時的聖母堂，附近都是那些七層大廈徙置區。當時好「興」³去探訪，會見到當時的生活，有些人住在路邊，因為房間細小，又是大家庭，家庭都有六、七個人，有張床，有張可以摺起的食飯枱。晚上多數是在穿膠花，家人全部都一起做的。做好之後，貨車便來接貨，同時送新的材料來。

油塘一帶的開荒者

在70-71短短的一年間，狄神父先後服務過紅磡聖母堂和油麻地聖保祿堂，然後重回油塘聖雅各伯堂。

我們修會在油塘，那位神父在油塘建一間中學——普照中學。⁴他在油塘做本堂，而且剛好在高超道有新的屋邨，使他很忙。修會派我去油塘協助他，做副本堂神父。他給我負責高超道那新發展的屋邨。因為油塘沒有地方住，他住在幼稚園，我住在普澤小學⁵，住了兩年。

我是負責新發展的這個屋邨，第一台主日彌撒有四個人，是一個媽媽和三個女，在學校裡面用一個課室。慢慢地，兩年之後，經常會有五、六十個人來主日彌撒，都是用學校課室的。

我負責高超道那區，慢慢組織彌撒的讀經組、歌詠團；慢慢要認識人，因為是新的屋邨，大家都是新搬來

³ 流行的意思。

⁴ 根據「天主教普照中學」網站，該校是由聖母聖心會史達生神父（Ernest Stassen, CIMM）於1970年創辦。

⁵ 天主教普澤小學由聖母聖心會創校，已經停辦。

的，主要是探訪。當時還可以探訪，不會有人干涉你，你可以周圍走去探訪，慢慢認識新搬來的教友，慢慢就組成一個基基團。

由社區走進校園

過了幾年，狄神父被調派往人口更少的坑口，負責清水灣的聖雲先堂。

我去了聖雲先堂一年。我起初去聖雲先堂時說，沒甚麼事做的，坑口那條是細村，教友又不多。其實整條清水灣道差不多都是這個堂區的，即是地方很大，但是人很少。星期六晚有一台彌撒，星期日早上一台彌撒，平日都不知道做甚麼好。早期我跟會長說，不可以這樣，在這裡做不到甚麼，我只是做「花王」。⁶

又過了一年，修會會長跟狄神父說，既然他不喜歡，就調派他到別的堂區，但此時的狄神父竟然拒絕？

我跟會長說，對不起，現在我喜歡。為甚麼？因為當我沒事做的時候，不知道是甚麼原因，有一日德望（學校）的修女來我堂區參與彌撒，便跟修女聊天，聽說有位修女病了，德望中學的，她教聖經科。

當年的校長林修女，Sr. Mary Olga（林玲娟修女），她說：「神父，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，你不能說不可以。你要幫我，我的修女病了，我要找教《聖經》的老師。」修女說不能說不可以，那我就答她：「好吧。」因為在聖堂都沒事做。修女說代課兩、三個月，那我就去試一試。

⁶ 即園丁。

怎知，幾好的，因為她們上課是用英文，可以用英文，聖經科的書本是英文的，但可以用中文講課，對我來說是容易一點，覺得幾好，都幾喜歡。後來那位修女三個月後都未康復，要延期差不多半年。

後來會長說：「你说不喜歡這裡，我們便作新的安排，你走吧。」我說：「對不起，不可以，我在教書。」會長說：「這是你的問題，是你決定的，你自己解決吧。」

當時胡振中主教委任狄神父到藍田堂區，他把這個情況告訴主教，主教讓他繼續代課，直到修女回校。自此，狄神父涉足教育界，出任多間天主教學校的校監。

後來發現，原來學校是跟青年接觸的一個好好的環境，而且我們是講福傳的。對我來說，在學校的，不要稱為「工作」，是「服務」。牧民工作，無論如何，是在教堂內的，主要是為教友的，但教育是為大家的。

香港的安排是很特別的，辦學團體可以有校監。既然學校需要校監，這為我一方面是為教會的服務，以及對校長和老師，都是一項服務。校長是學校裡最高的，如果學校團體不理想的話，校長是很寂寞的。教育是很重要的，道德觀的基礎，福音的精神，是教會對香港社會的一大影響，過去與現在都是。

見證社區的拆與建

狄神父在 1977 至 83 年間在藍田聖愛德華堂擔任本堂，至今仍記憶猶新的，是附近山頭的幾場大火。

起初在聖愛德華對面，有一座山，甚麼都沒有的，一個山頂。誰知過了一、兩年之後，整個山都是木屋。有一個主日，開完彌撒，我望著外面，有一群男士站著，望向那座山，即是那木屋區。我覺得很奇怪，為甚麼呢？不知道在做甚麼。

原來那晚有山火，後來聽到其實人們是知道的，他們知道會有山火，他們有些人已經離開。木屋是很簡單的，有甚麼？有個電視機，有個洗衣機。有電的，是偷來的電，其實是偷我們學校那條大電纜。我不知道他們如何做，是駁電，也曾經燒斷過，又因為下大雨浸了水，我們學校也試過有三日停電。

他們其實是黑社會，他們搭蓋木屋賣給人，他們有供電，但都是偷的。那晚全座山都燒了，我見下午人們已經在搬東西，他們知道，是會有山火的。燒完之後，怎樣呢？就再搭，都是黑社會，他們再搭、再賣，是做生意。

我在藍田六、七年，有兩、三次這樣的山火。我們說，都不知道是誰，是黑社會，或者是政府。因為要那些人搬走，要發展，要安排的話很麻煩，即是要登記安排，最簡單就是燒掉，變成難民。那些人很可憐，做不到甚麼，一有山火，因為有風，很快地四周都起火。

來港傳教五十載

2018 年剛好是狄神父在港傳教半世紀的紀念，在這段傳教生涯裡，狄神父覺得生活上最大的改變，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在這個城市發展中變得疏離。

由早期的徙置區、七層大廈，然後是公屋，可以隨時出入，沒有人會查問。後來開始有鐵閘，有看更。現在，如果你想去探訪，你要預先去約人，否則會問你去哪裡、幾號門牌。我試過去找一個人，知道同一座有其他的教友，就給他一個地址，去完那裡便去其他地方。他看到，來捉住我，他說：「你說去那裡，為何又去那裡？」現在更嚴，現在不可以了，要登記。

生活的環境變了很多，以前是很開放的，大家都認識的。我們在徙置區的時候，有些小朋友家裡沒有人，去鄰家食飯。但現在不是了，鄰居都不認識了。

以《公教報》強化教會與教友的溝通

—— 駱鏗祥神父

1939 年	出生於香港
1948 年	在聖安多尼堂受洗
1962 年	畢業於新亞書院
1964 年	進聖神修院，哲學畢業後，67 年赴羅馬傳信大學修讀神學
1971 年	晉鐸
1971 年	擔任公教報編輯
1972 至 2011 年	擔任聖母軍督察區團神師
1978 至 2006 年	擔任教友總會指導司鐸



(圖：駱鏗祥神父，攝於 2018 年)

訪問、撰文：陳樂信

駱鏗祥神父出身自聖母軍，在白英奇主教的時代進修院，是被派送羅馬攻讀神學的國籍修生之一。他晉鐸於徐誠斌主教的時代，先後擔任《公教報》編輯、聖母軍神師及教友總會神師等要職，見證香港教區在這兩個時代交接下的重大轉變。

公教家庭中的獨子

出生於 1939 年的駱神父，與父母和兩位姐姐在港島西區成長。這個本來沒有信教的傳統中國家庭，在機緣巧合之下認識天主，全家領洗奉教。

那時候有一位阿姨，在澳門替神父煮食的，她領洗了。她來探我們，介紹我入讀天主教學校「聖類斯」。那時我住近第三街，靠近聖類斯，進去之後，慢慢聽道理，便全家一起領洗了。

（父母）起初是有點不習慣，不過慢慢被薰陶了。天主教在香港都已經有不短的歷史。中國人一直都是拜神、拜灶君之類，時令都是中國的節令，信仰方面就要有一點改變了。

最令父母意想不到的，這成為了兒子日後「出家」修道的引子；始終，傳統父母大都期望兒子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。

這都是一個特別之處，家裡有兩個姐姐，我是獨子，其實那時這一關都頗難過。家人看到自己如此大的決心，兩個姐姐又支持，家人就算了，放我一馬。我好感謝兩個姐姐，「你讓細佬去吧，我們照顧家庭」，於是放心一點。

聖召與修道之路

聖類斯學校屬慈幼會，駱神父憶述，當時校內仍有不少會士，而且以傳教士為主；他們說得一口流利廣東話，很懂得跟小孩子溝通，又會派糖哄學生，所以小朋友都很喜歡他們。

在聖類斯已經開始跟著一個神父活動，後來去了新亞（書院），讀完中文大學之後，接著我們有幾個一起生活的，即是李國雄、譚坤，有一位神師帶領我們，Father Szeliga 薛理覺神父¹，所以我們一直培養自己的聖召。

我特別跟譚坤神父都住在西環，剛剛好斜對面，所以我們返聖安多尼堂做聖母軍，開完會就一起走到海傍，來回途上談天說地。在聖神修院又一起，接著去羅馬讀書又一起。

67年，那時可能剛巧香港暴動，時勢又混亂，所以我們幾個哲學和神學生，都去了羅馬那邊讀書。也是一個契機來的，如果不是因為香港發生動亂，都未必一定去羅馬讀書的。

當年香港的左派工會受大陸文革風潮影響，在港發起攻擊殖民政府的暴動，導致社會動盪。有見及此，白英奇主教決定保送聖神修院的修生遠赴羅馬學習，他們亦因此近距離經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（梵二）為教會帶來的變遷。

讀哲學的時候，已經不用拉丁文，用英文的了。用英文就舒服好多，因為用拉丁文的時候，我們讀哲學時都有用拉丁文，只有死記。

我們去羅馬之前，去羅馬鄰近一個城市，讀意大利文一年，然後便開始在羅馬上課。最初，即是神學第一年，上半年教授還是用拉丁文講的，上到一半，有人「嘈」²，

¹ 薛理覺神父（Thomas Szeliga，1915-2005）出生於波蘭，1941年在香港晉鐸後，主要服務於港澳兩地的慈幼會學校，他在1955-66年間擔任聖安多尼堂助理主任司鐸。參慈幼會中華會省：〈薛理覺神父（Fr. Thomas SZELIGA）安息主懷〉，《鮑思高家庭通訊》，第185期。

² 廣東話，吵鬧的意思。

嘈到他講不到課，最終要用意大利文。所以，教會本地化影響整個歐洲，影響整個教會。

在羅馬接觸到很多不同的思想、不同的人與物，令思想的改變很大，你會接觸到歐洲的文化、中東的文化。又剛好是大公會議的交接，那個新的思想、思維非常緊要。

修院、中大兩邊跑

駱神父進修院之前，畢業於當時仍位於農圃道的新亞書院，亦曾執教於港島的高主教書院及九龍的新民書院。及後香港中文大學成立，駱神父獲修院准許，同時修讀中大的學位課程；這似乎為他日後的職務埋下伏筆。

我那時在新亞書院讀中文，畢業後才進修院的。那時，中文大學仍未成立，還是新亞、崇基、聯合三間，我們是考統一文憑試的，還不是學位。後來我進修院，一年後中大就成立。

那時我正在讀哲學，於是我跟院長（唐多明神父³）說，希不希望我拿個學位，可能將來有用。院長和副院長都支持，說「回去讀吧」。所以我一邊讀哲學，一邊返中大，去完成學位課程。

所以，我那時跟教授說，我會來上課的，我們只有三個人，但你不要問我書，直到我考完，拿到學位後，你便可以再問我書了。

新亞書院由錢穆創辦，也與其他新儒家學者唐君毅、牟宗三等人組成，富宏揚中國文化的使命。駱神父也有跟這些老師學習，至後來又接

³ 唐多明神父（Domenico Bazzo，1906-1998）屬宗座外方傳教會，1933年來香港，在1963-67年間擔任聖神修院院長。唐神父1988年返回意大利，繼續牧民的工作至1996年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網頁，〈唐多明神父〉：<http://bit.ly/2VFvjlo>。

受西方哲學、神學的培育，兩者為他來說並無衝突。

我們讀書時都有受他們影響。我們讀哲學時，是讀唐君毅的，他本身就是中西方哲學融和的一位特別的學者。中國文化，加入教會的原素，可以使中國文化更加發揚光大。

入主《公教報》

當年駱神父從羅馬返港時，心想有兩項工作不要接手：「第一是千萬不要接《公教報》，覺得好辛苦；第二，我是聖母軍出身，不要做聖母軍。」怎料，在1971年晉鐸的他，最終還是肩負起這兩項工作。

因為我是在中文大學新亞書院中文系畢業，所以那時徐誠斌主教見我們，分配工作：「譚坤神父就去帶大專，你讀中文，不如就幫手《公教報》吧。」

從駱神父口中得知，《公教報》在徐主教的時代，有幾個相當重要的轉變。

因為他（徐主教）親力親為，印刷廠是他親自建立的。以前我們給「星島」印的，他一來到便設立印刷廠，只印《公教報》。所以徐主教在《公教報》上居功非常偉大。印刷廠在荃灣，後來搬回到堅道的教區中心。

以前一直都是主教做編輯的，有些修女等等只是做副編輯的；直到我開始，以神父的身份做《公教報》，他給我當編輯。除了「社論」要給他過目，就放心讓你做。

幸好有位很有經驗的助手，諸正琪，她已經做了很多年，很熟悉內部運作，所以她在做助理編輯，真的很好。亦有一位專門翻譯的，翻譯「社論」為英文。這兩樣如此重要的工作，都有專人去負責。

我做之前是很少訪問的，我開始之後就做多點訪問，例如邀請一些教友幫忙，訪問不同的人物，放在《公教報》裡，使透過《公教報》，人與本地教會的溝通更為強化。

駱神父感謝徐主教的信任，把教會辦報的重任交給自己；不過徐主教由始至終，都特別重視「社論」，因為這是代表教會。而駱神父在擔任《公教報》主編的日子裡，較為深刻的，都圍繞教會與社會的關係。

我們跟得很貼的，例如「金禧事件」⁴，是一個好的契機，關心社會的契機，即教會與社會是分不開的，會有很多社論和訪問。其中一篇社論叫〈上主之鞭〉，即是藉著這件事來鞭策教會，行快一點，醒覺一點。

接下聖母軍

從羅馬回來之後，我第一日就見到濟利祿神父⁵，濟利祿神父當時是負責聖母軍的。我回來，他說：「好了，我已經頭又痛，我要回意大利退休了。你在聖母軍長大，我將個『波』⁶交給你了。」

駱神父表示，當時相當不願意，因為他早年在聖安多尼堂參加聖母軍，早知負責聖母軍是很忙碌的工作。

我們未進修院之前，常常跟著濟利祿神父，當時他是聖母軍的總神師，坐他電單車後面跟著去探訪。我們有一次經驗就是，香港仔堂區（聖伯多祿堂），我和譚坤神父二人那時都是聖母軍，是區團的正副團長。我們走去，那時香港仔還未有聖母軍的，我們便去探那位神父。他問：「你們來做甚麼？」

⁴ 「金禧事件」是指 1977 至 1978 年寶血會金禧中學發生的一次學生運動，因教師權益及校方財政混亂引發學潮，轟動全港。金禧中學是天主教修會的學校，故此也牽連香港教區。

⁵ 濟利祿神父 (Cirillo Speziali, 1911-1980) 屬宗座外方傳教會，1938 年來香港。濟神父 1955 年赴愛爾蘭考察聖母軍，及後長期擔任香港聖母軍督察區團神師，致力聖母軍在各堂區的發展。濟神父在 1956-59 年間亦負責教區教理中心，是教理課程的創辦人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網頁，〈濟利祿神父〉：<http://bit.ly/2lo0QEG>。

⁶ 香港人用「波」來表示責任。

我們說，我們想來幫手發展聖母軍。他捉著我們二人，拖我們走，趕我們走，說「你想小朋友結婚嗎？」即是他覺得，他們堂區尚未成熟至要成立聖母軍，好像你見到個小孩子結婚一樣。怎知幾年之後，那神父調去灣仔，那我們便在香港仔那裡成立聖母軍。

堂區善會每個月才開一次會，開會沒甚麼的，幫忙堂區、賣聖物、收捐獻之類。但如果做聖母軍的話，每星期開會，又要探訪，又要教道理，有很多工作，真的不容易。

六、七十年代，聖母軍只是剛剛開始，所以未有好好的發展。白英奇主教的時候，說：「我希望每一條街，都有一個聖母軍」，他有這樣的理想。所以，當我們開始發展聖母軍的時候，他很支持。

他在大陸被驅逐出境，來到香港，他心想如何可以找到教友團體去幫我們，在教區裡面發展呢？想了很久很久，於是他說：「我揀選聖母軍。」於是找了他們修會的濟利祿神父，主力發展聖母軍。

我便跟著他去探訪，探訪堂區，發展聖母軍。因為他想找個中國人，說廣東話會容易些、好些。所以我們坐他電單車後面，周圍去堂區見本堂神父。所以受他的影響很大，他影響到我對這個團體有歸屬感。

因此，駱神父晉鐸之後，他從濟神父的手中接下了聖母軍，而且一做便四十年。

國籍牧者接撐香港教區的新一頁

香港教區成立以來，主要職務和權力都是由外籍神父負責。直至徐誠斌於 1969 年正式成為首任國籍主教後，他開始讓國籍司鐸擔任教區內的重要職務。

我覺得白英奇主教能夠將自己的主教權柄交給華人，這是很大的智慧。特別那時徐誠斌主教的主要工作，是在公教進行社，他沒有堂區經驗，所以普遍堂區那些中國神父都不太歡迎他，所以他做主教有很大壓力。

自徐誠斌主教開始，大部分主要職務都由國籍神父擔當，他們（傳教士）覺得要支持，以前都是由他們負責最高的職務，但徐主教開始之後，接著將教會本地化，所以要讓更多國籍神父、修士肩負教區工作。

我覺得這個的重要性是非常大。自從白英奇主教放下主教一職，交給徐誠斌，本地教會就開始一直發展，更大的發展。其實外籍神父們犧牲很大，他們不想肩負教區內的一些主要職位——主任司鐸、委員會的主席，他們做副手，讓國籍司鐸去擔任。他們比起我們司鐸更加有經驗和能力，不過他們都覺得，這是教會的大勢所趨。

這是傳教士愛教會、發展本地教會一個很大的表現。



（圖：駱神父（中）向為他慶祝八十大壽的教友們祝酒。

圖片來源：聖方濟堂·攝於 2019 年 3 月 30 日）

於葵芳挨戶尋找及探訪教友的開荒者

—— 萬籟寂神父

(Fr. Mario Marazzi, PIME)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28 年 | 出生於意大利 |
| 1960 年 | 晉鐸，初來香港，在長洲學習廣東話 |
| 1963 年 | 任公教進行社副社長，後升任社長 |
| 1971 年 | 任聖老楞佐堂助理主任司鐸 |
| 1972 年 | 調任荃灣葛達二聖堂主任司鐸 |
| 1975 年 | 同時負責葵芳守運樓彌撒中心工作 |
| 1978 年 | 任宗座外方傳教會香港區會長 |
| 1980 年 | 返回意大利為修會服務 |
| 1999 年 | 重返香港，任馬鞍山聖方濟堂助理主任司鐸 |
| 2003 年 | 移居廣州，入住「慧靈」家舍，與智障人士一起生活 |
| 2013 年 | 於香港宗座外方傳教會 (PIME House) 退休 |



(圖：萬籟寂神父，攝於 2018 年)

訪問：陳樂信、黃奕清

撰文：黃奕清

1960年，幾位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從意大利漂洋過海，來到亞洲，各自在不同地區開展漫長的傳教旅程；當中的一位，正是接受派遣，前來香港的萬籟寂神父。

我是坐船來香港的。原本可以乘飛機，但同行當中有我們的會士，有些要去印度，有些前來香港，大家都攜帶了許多行李，於是我們決定一起坐船。我的家鄉有一間製造電單車工廠，鄉下的教友送了一輛給我。那電單車在香港是獨一無二的，要換零件就困難了。但我覺得，他們熱誠地送給我，我會帶去香港。輪船在海上航行了四個星期左右才到達香港。

那艘大洋船，先後停泊在巴基斯坦的 Karachi（卡拉奇）、印度的 Mumbai（孟買）、斯里蘭卡的 Colombo（科倫坡）和星加坡，最後是香港。那天深夜時分，船已抵達香港，大家仍在熟睡中；清晨醒來，船停泊在海港裡，我看見這美麗在香港，實在漂亮得令人讚嘆！

原來萬神父有位親戚和另一位同鄉神父，都是傳教士，他們早已來到香港。因此，萬神父對傳教工作，以及對中國，尤其是香港，早已有初步的認識。

那兩位傳教士，賴神父¹和毅神父²，在香港傳教時，

¹ 賴法禹神父（Ambrogio Poletti，1905-1973）屬宗座外方傳教會，1930年來港，前期主要在廣東省惠州傳教，後期服務於新界東北地區。賴神父自1950年起，在粉嶺拓展新堂區，興建聖若瑟堂；期間他在羅湖邊境迎接被中國政府驅逐的傳教士，因而有「中國門衛」的號稱，更獲意大利政府於1956年頒授意國騎士章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網頁〈賴法禹神父〉：<http://bit.ly/2Kw7P13>；「粉嶺聖若瑟堂」網頁：<https://fanling.catholic.org.hk>。

² 毅祿師神父（Riccardo Brookes，1892-1980）屬宗座外方傳教會，於1921來港，早年出任新界西區主任司鐸，被稱為「元朗區傳教的先鋒」。毅神父服務過鄉郊及城市社區，擔任過香港教區秘書長及副主教等要職，亦曾任監獄神師和麻風病團體神師。參柯毅霖：《從米蘭到香港：150年傳教使命》（香港：良友之聲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138。

某年回鄉度假，那時，我仍未入修院，趁機會聽他們給我講述傳教的工作。他們返港後，我寫信給他們，彼此保持聯繫。此外，意大利也有些雜誌，刊載有關傳教士的工作。因此，我對傳教工作，尤其是對香港，能有一點兒認識，聖召的小小種子就從那時候開始了。

第一站：長洲

地方語言是很重要的，它好像一根鎖匙，進入人的心中，幫助我們認識所接觸的人。傳教士為人服務，我相信講得愈好、愈流利，並懂得欣賞他們的語言，那是對他們的尊重，亦可以更接近他們。

跟大多數傳教士一樣，萬神父很重視地方語言的學習和運用。在香港提供廣東話教授的「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」1963年才於新亞書院成立，那麼，早年來港的傳教士們，是如何學習廣東話的呢？

早年在長洲有間屋，叫「上智之座學院」³，我們五位新來的神父在那裡學習語言。教授語言的，一位是本地的中文老師，另一位是懂得說廣東話的宗座外方傳教會神父。他們兩位和我們一起生活，我們除了在課堂正式學習語言，也有機會在日常生活中彼此交談和分享，練習和實踐所學的廣東話。這方法不錯！幫助我們慢慢地去掌握。

奇怪的是：人們總以為外方人一定懂得說流利的英語！其實，我們那時只認識一點點。於是，我們同時要學習中文和英文，太艱辛了！我們發現兩種語言一起學，不

³ 「上智之座學院」，英文是 House of Study，成立於 1954 年，開辦十年，為新抵港傳教士提供中文和英文的學習；該址現為明愛愛暉營。參柯毅霖：《從米蘭到香港：150 年傳教使命》（香港：良友之聲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81。

是很好的方法。其後，多數受派遣來港的傳教士，會首先前去美國或英國，以一年時間學習英語，然後才來香港，集中精神學中文。

跟語言同樣重要的，是適應生活，也就是生活本地化。學會運用語言是不夠的，一定要慢慢去適應當地的環境、風俗和習慣，inculturation。

在長洲，我們有機會好好的去練習廣東話：山下的聖堂，有許多小朋友，我們可以前去和他們交談；也可嘗試到街市去買點東西。簡單的用語，是練習語言的好機會。我們大多經歷過這樣的情況，覺得語言進步的成效不錯。

下一站：公教進行社

在長洲生活了一年半之後，萬神父獲安排到堂區服務。1963年5月，主教又調派他到公教進行社。萬神父坦言，這是一項「挑戰」，但他感恩在那段時期，遇上好幾位國籍神父，包括後來升任主教的徐誠斌神父。

來到香港起初三年，主要是讀書，也在聖堂做些牧民工作；但在公教進行社的工作是截然不同的，我做副社長，後來升做社長。作為一位神父，一位外國人，我要負責管理四十多位職員，真的很不習慣；要做他們的上司，是個很大的挑戰！

幸好，那時徐誠斌神父在公教進行社工作，他是我要好的朋友，他很支持我的工作。另外，有兩位國籍神父，也和我一起工作，一位是尹雅白神父，他負責編輯《公教報》，另一位是李國雄神父，負責真理學會，出版書籍。

在公教進行社工作八年的日子裡，我一直得到神父們的合作，這使我感到一份支持和喜悅。

我可以用廣東話和英文與別人交談，但範圍只限於書本和關於聖物之類。我的英文漸漸有進步，因為有機會接觸外國人。此外，主日多數會去赤柱監獄探訪囚友，為他們舉行彌撒。

這期間，萬神父見證了香港教區的一件大事，就是白英奇主教的離職和首位華人主教的出現。

白英奇主教於1969年辭職。因為他覺得香港教會成熟了，是時候把教會交給本地的神父和教友去管理。我仍記得，徐誠斌主教請他留在香港，但他沒有答允，因為他怕會阻礙新任主教的工作。我們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們都為此事高興，因為我們覺得這情況就好像一位爸爸，一位媽媽，看著自己的兒女長大了，離開自己的家庭去結婚，父母當然感到歡喜，因為子女們成長了，要走自己的路。

還未到香港之前，我以為傳教的工作主要由 PIME 會士去做，不太清楚也有其他人致力於傳教工作。到了香港，我發覺已有許多人正在做傳教的工作，如外方傳教會——瑪利諾會、聖母聖心會、巴黎外方傳教會；男女修會，如耶穌會、慈幼會、嘉諾撒會、母佑會等等。

還有，當時香港的教友已經成熟，很多教友已懂得傳教的責任；除了外籍傳教士，本地神父、修女和平信徒已致力於傳教的工作。

中轉站：聖老楞佐堂

萬神父有感於公教進行社工作，很少機會練習廣東話，說話內容的範圍亦相當狹窄，語言表達難有突破，遂主動要求徐誠斌主教把他調派到堂區服務。於是，萬神父在 1971 年被派往長沙灣聖老楞佐堂，出任副本堂。

以前很少機會接觸外面的人，沒有機會去探訪教友，更不會跟別人吃飯，這是第一次在堂區裡跟教友和非教友來往，接觸他們。

我在聖老楞佐堂待了不久，有一天會長通知我，我的媽媽由於意外去世了。那天，她在行人路上走，有一位青年早上趕上班，所駕的電單車把她撞倒了。當時，會長只告訴我：媽媽已經過世。

我仍記得：當天早上得知這件事，而下午我要往長沙灣墳場去主持喪禮。死者是一位母親，在場只有她的丈夫和兩、三位小朋友。我主持喪禮的時候，把這位剛去世的母親看作是我的媽媽。那時，我覺得這位男士很可憐，他沒有親友的陪伴。我沒法回意大利去主持媽媽的喪禮，因此，我以一份對媽媽的愛去舉行這次喪禮。那時刻，我感到這個家庭就好像是我的家庭，他們的痛苦，也是我的痛苦。

下一站：守運樓

萬神父在聖老楞佐堂服務了大概只有一年，便調往粉嶺堂區，然後在 1972 年年底，又調派到荃灣葛達二聖堂去。適逢荃灣區在六十年代初已被政府規劃為香港首個發展的新市鎮，多個新社區在七十年代陸續形成。

在荃灣堂區，我作為主任司鐸，有幾位神父和我一起
做牧民工作。有一天，我和副本堂劉玉亭神父⁴商議：
「你做本堂神父，我做副本堂神父。」他考慮了一會才答
允，主教也願意我們互調職務。

那時，一些新的社區——葵興、葵盛、葵芳，於1973
年至1975年陸續入伙，我和劉神父一起去見主教，跟主教
談這區的發展。及後教區在葵芳一幢私人樓宇（守運樓）
買了一個單位，讓我和周偉文修士⁵一起住。就這樣，我
們在那裡開始了一個新的彌撒中心，為堂區內的居民服
務。

在葵盛，母佑會開辦一所「蕭明中學」，修女願意讓
我們每主日在學校禮堂為教友舉行彌撒。我們開始認識教
友，給他們登記戶籍，漸漸組成一個團體。

為了找到新入伙的教友，我們這樣做：當我們知道某
座大廈差不多全部入伙後，我們幾位神父和教友，開始由
最上層的二十樓，走到最下層，逐家逐戶敲門問：「請問
有無教友？有沒有天主教的呢？」如果沒有，屋裡的人就
立即回答「無」；如果有，他們可能回答說：「咩？乜
嘢？」⁶看到他們沒有立即回答，我們知道可能會有天主
教徒。我明白他們小心翼翼的原因，是由於他們不太喜歡
鄰居知道自已的事，想保護自己的私隱。我們站在門外和

⁴ 劉玉亭神父（1927-2010）出生於河北，1949年來來香港，生前大部分時間在荃灣及葵青的堂區服務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，〈劉玉亭神父〉：
<https://bit.ly/2IxLQF9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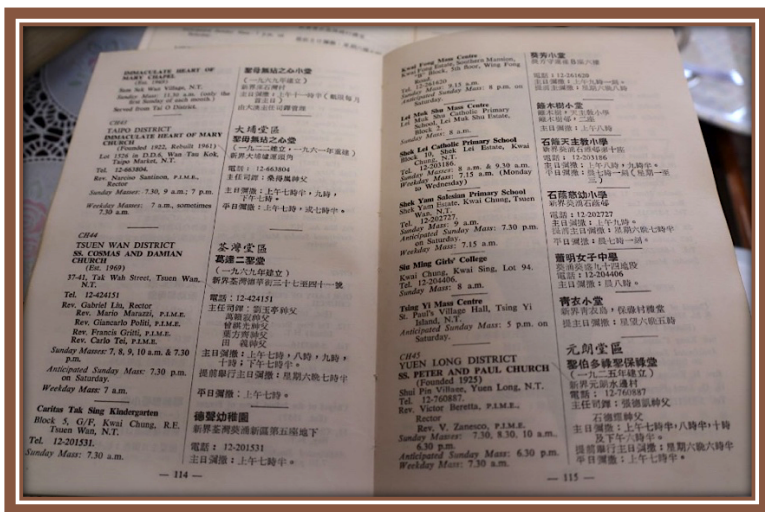
⁵ 周偉文神父（Renzo Milanese）屬宗座外方傳教會，1946年於意大利出生，1972
年來港服務至今。

⁶ 廣東話，即「甚麼？甚麼事？」

他們傾談，叫他們不用開門，只寫下門牌號碼和姓甚麼，改天神父會去探訪。

那時用這個方法去接觸教友是最成功、最容易的。有些年青人幫手，和兩位神父一起去，做初步接觸教友的工作。那時這樣挨戶探訪是沒有人阻撓的。我們多數在晚上出訪，因為晚上比較多人留在家中。

除了知道居民當中有沒有天主教徒和宗教方面的情況，也可以知道當中有沒有人遇到困難。他們中有些是病人，有些是殘疾的，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接觸、去幫助他們，並找方法去解決他們遇到的問題。



(圖：萬神父仍保存的天主教手冊，顯示他在荃灣葛達二聖堂服務)

這就是葵芳聖斯德望堂的前傳。到了 1980 年，聖堂建築竣工，守運樓彌撒中心的歷史任務亦告完成。而在荃灣的這段日子，大約 1974 至 78 年間，萬神父更參與過由天主教、救世軍、聖公會、循道衛理和中華基督教會幾個教會一起推動的社區發展工作。

我們五個教會的牧者和教友在大窩口一起策劃一個社區發展項目，得到一筆款項後，請了一位社工做負責人。

雖然我們來自不同的教會，但在社會服務方面，大家可以走在一起，彼此有個共同目標：幫助人去改善環境，令大窩口居民可以有意識地合作做點事，使生活環境更好。漸漸地，大家都樂意去做這些工作，不用給予酬勞，只需提醒他們在自己的社區發展中，要有承擔，這是在大窩口邨同心合意去做的事。

這是一個好好的合一經驗。合一運動有幾種，有神學的合一運動，即是由專家討論神學的問題；有祈禱的合一運動，那是屬於不同教會的教友，聚在一起祈禱。我們做的，是生活的合一運動 Life Ecumenism。

藉著對社區發展的關懷，我們有機會跟其他牧師和其他教會的教友彼此認識。我們五位神父和牧師每個星期一次，在某地方飲茶、聊天和討論。我們曾在合一祈禱周交換講道，我去了中華基督教會，而該教會的牧師則前來我們的聖堂講道。有時候，我們和教友們聚會，談大窩口的社區發展，鼓勵天主教的教友跟基督教的兄弟姐妹接觸，做朋友。

一個中西薈萃的經驗

回顧在香港二十年的傳教生活，萬神父體驗到香港教會已有相當成熟的文化融合，他看到教區內有很多外籍神父和修女在不同層面上跟本地人合作，認為這對香港社會來說，是一個好榜樣。

神父們在堂區裡，無論主任司鐸是中國人或意大利人，與不同國籍的神父一起生活，是一個好的機會一起合

作，服務堂區。大家對屬於不同國籍的人沒有半點歧視，整體來說，我覺得很好。

我在 PIME 做了兩年區會長，對於教區事務，我曾參加人事小組的會議，主教及小組的幾位神父，要決定調派誰服務堂區時，人事小組無所謂，只要誰人適合就派誰去做。整體來說，是很開放的。

對於我們外籍神父，教友們的態度同樣開放。教友們不分國籍，只要神父是個好神父，他們都會歡迎他。教友們見到我們盡力學習語言，以及慢慢去適應本地的風俗和習慣，他們都樂意接受我們的有限、錯誤或缺點。

一個未結束的旅程

萬神父於 1978 年離開葵芳，回到宗座外方傳教會在清水灣的會院 PIME House 當區會長，然後於 1980 年返回意大利總會工作，一去十八年。當再次重臨他傳教的地方時，萬神父欣見「香港社會和教會都改變了，改善了。」

從萬神父的言談間，處處感受到他與香港人之間，累積了一份濃厚的感情。他分享道，當傳教士，首先要愛那個民族、那些人，即是要做朋友。他同時感受到香港人對傳教士的歡迎和接受，心存感恩。

雖然我們有限，很多東西都不太了解，這是真的；但本地人對我們很好，又得到主教、神父、修女和教友們的支持和幫助，為此，我很感恩。

萬神父 2013 年退休了，他選擇繼續留在香港居住。

本來我可以返回意大利退休，在那裡，與年紀大和患病的會士一起，入住一間本會的安老院。但我想繼續留在香港，不是因為這裡的居住環境比意大利好，其實無論住

在香港或返回意大利，為我都是一樣的。但我認為：我曾被派遣來香港傳揚福音，為本地教會服務，所以我會留在這裡，直到永久是有意義的。

我雖然退休了，但還可以出外做一點牧民和傳教的工作，而且在我的修院裡，也可以為團體做點服務。現在，我有多些時間去祈禱、看書和寫信，跟朋友保持聯繫。即使我的身體有時欠佳，不容許我常這樣做，但我仍然可以為香港和中國的教會，尤其是為那些曾經幫助我的人，或有需要的人祈禱。

當白英奇主教完成他做香港主教的職務之後，他對香港的教友說：「親愛的朋友，我若有甚麼地方使你們失望，請你們原諒；若有甚麼地方做得對，則請你們感謝天主。我時常是你們的僕人和朋友，一位祝福你們，並為你們祈禱的長者。」白英奇主教以上所說的話，也是我要說的話。

在文字中履行牧職

—— 李國雄神父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937 年 | 出生 |
| 1959 年 | 畢業於羅富國師範學院 |
| 1964 年 | 進入聖神修院 |
| 1969 年 | 晉鐸 |
| 1971 年 | 赴比利時天主教魯汶大學深造宗教倫理神學碩士 |
| 1973 年 | 任香港仔聖伯多祿堂助理司鐸 |
| 1974 年 | 任公教真理學會主編 (至 2015 年) |
| 1976 年 | 任聖母軍區團神師 |



(圖：李國雄神父，攝於 2014 年)

訪問：黃懿縈

撰文：陳樂信

最早在香港出現的天主教出版及印刷機構，是巴黎外方傳教會創辦的「納匝肋印書館」，始於 1885 年，為該會在亞洲地區的傳教工作，編印不同語文的宗教書籍。¹ 隨著教會在香港的發展及因應培育本地教友的需要，「公教真理學會」在 1934 年誕生，成為香港教區轄下的出版社。

李國雄神父在 1969 年晉鐸後，便獲徐誠斌主教派到公教真理學會。他擔當主編四十年間，為教義內容和出版路向把關的同時，見證閱讀風氣的轉變。李神父本身愛好閱讀，他應《公教報》主編之邀，在八十年代每周撰寫專欄，內容融合天主教靈修與中國文化。他也出版了八本小型書籍，有的結集聖母軍的「神師訓話」，有的是為海外華人教友撰文，透過文字為教友的信仰生活提供滋養。

信佛家庭裡的天主教修道人

李神父自小學二年級起在天主教學校接受教育，慈幼會的校園是其信仰成長的重要場所。即使沒有家人的鼓勵，亦明白家人對自己的期望，但他還是在中三領洗入教，而且中五時已有加入修會的念頭。

那時正在打仗，日本佔領香港期間，我住在中環，入讀現在的聖心學校，當時叫「培貞」²，收男生至四年班，我讀二年班。戰後和平，我家搬到西環、西營盤那邊，便入讀聖類斯學校，由三年班讀到中學畢業，與慈幼會的神父一起相處，受他們教導。

¹ 田英傑編著、游麗清譯：〈納匝肋印書館（1885 年）〉，《香港天主教掌故》（香港：聖神研究中心，1983），頁 138-142。

² 培貞學校是由來自意大利的嘉諾撒仁愛女修會在 1860 年創辦的中文學校，只招收中國籍兒童入讀，後來由於需要投宿的貧苦女孩人數太多，改建為孤兒院學校。培貞於 1937 年與修會在同年開辦的英、葡文學校合併，定名「嘉諾撒聖心學校」。參夏其龍、譚永亮編：《香港天主教修會及傳教會歷史》（香港：香港中文大學天主教研究中心，2011），頁 92、95；嘉諾撒聖心學校（私立部）網頁。

在那裡慢慢地，自然地受吸引，中一時已經很接受天主教信仰，但家裡是傳統信佛的，因而覺得未有機會。中三時試探家人，說去學道理，他們是無可、無不可的樣子。我用辯論式的方法跟他們說：「既然讓我入天主教學校讀書，我想學道理，你讓我去嗎？」他們看作我去上課，但我學的道理班是為預備領洗的，兩個星期之後便領洗回來。他們問為甚麼這麼快，我說：「已經學了很久，既然你同意我學道理，自然的結果便是領洗。」於是家人也接受了。

讀到中五，神父來到我家，叫我家人讓我加入慈幼會，但家人不肯，要我出來工作幫補家計，而且覺得我很消極：為何要去做神父呢？

既然不許，那我便想繼續讀書，即使家境不是很好，家人也讓我讀中六。那時因為拿到政府的津貼，所以經濟問題也放緩了，可以讀完中七，當時稱為 upper sixth。³

我由聖類斯轉到英皇書院，完成預科，考到香港大學的理科。我理科並不強，卻讓我考入了，即是勉強考入。正因為只是僅僅入到，所以成績不太好，我嘗試過向政府申請津貼，但申請不到，家裡又沒甚麼能力，結果轉讀羅富國師範學院。兩年後畢業出來教書，薪水大部分都給了家裡。

李神父 1959 年在師範學院畢業，執教至 1964 年。當年他雖然明知家境依然不好，但判斷家人能夠應付，遂下定決心進修院去。

³ 按英國學制，中學教育的最高級是「第六學級 (Sixth Form)」，第六學級為期兩年，分「較低 (lower)」與「較高 (upper)」兩個階段。

我想到，如果我再不入修院，可能慢慢便心淡，因為相隔上次表明去意已差不多八、九年了。我覺得需要自己決定自己的事，當時我也二十多歲，雖然未足三十歲。家裡是會比較艱難的，但我覺得他們應付得來，所以便決定入修院。

修院的生活，當時是比較單純的，你肯讀書，肯祈禱，便符合他們的期望。因為我打過工，教書時也拿了個學位，覺得可以減兩年。那時我算年紀大的了，通常二十多歲升神父，但我讀完都過三十了，所以他（院長）不想拖延得太久。

投入出版的工作

在李神父的記憶中，當時的修院生活跟他想像的一樣，主要是祈禱和讀書，後期做一點牧民工作。他 1969 年晉鐸，主教所作的安排，卻是他意料之外的。

我本來想到，我有教書的背景，又有學位，打算在修院幫忙管理中學，但當時的主教叫我來公教真理學會，是出版書籍的一個部門。我沒有做過出版的工作，技術方面有同事處理，我主要看教義，以及選擇出版路向，符合教區要求。開始的時候，當時教會比較單純，總之你是神父，用心做，人們都不會太批評的，通常都覺得可以接受。

兩年後，我覺得自己有需要的神學的基礎方面多下工夫，因為出版的外文書籍，很多時程度是較高的，所以要理解多點，而且神學真正所涉及的内容是相當深刻的，因此我要求主教讓我去深造，接觸一下歐洲的學術環境。

於是，我去了比利時魯汶讀了兩年神學，拿到了碩士。學的不算很多，但回來看書時比較能理解作者的背景，以及甚麼的路向要看甚麼的書，比以前方便得多。

這工作主要是語文方面有很大的挑戰和考驗。我們翻譯書籍，如果由英譯中，簡單一點；但有些英文是譯自另一種外文，那就複雜一點。有時心大心細，雖然請了人翻譯，但覺得有地方不對勁，便要多問一些人。由於語文的關係，有時很難把握到文字真正的意思，那就難一點。

雖然我也讀過拉丁文，略懂法文與德文，但並不深入，因為不是常用的文字，碰上了這些英譯便較複雜，有時單是想原意是否準確翻譯出，自己都覺得頗具挑戰性、頗辛苦。幸好，在教區中心時常有以英語為母語的神父，他們幫了我們很大忙。

時代變遷下的教會出版

李神父身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的前後；他提到梵二之前已經有不少中文的靈修書籍出版，在大公會議提倡本地化的氣氛下，便需要更多禮儀方面的中文翻譯。

初期很忙碌，每星期要印禮儀單張。因為是新的工作，所以工作的時間要求比較長，我所有時間都差不多全放在出版的工作上。

初期，禮儀方面我們是配合印刷，翻譯書籍主要都是靈修性和教義性的，後期多些聖經方面的知識。我們不是出版專業性的書籍，會出一些比較普及性的聖經知識，或者基於聖經的靈修書籍。

七零年代時，我們出版的靈修書很暢銷，可以印二、三千本。教理書都有很多人參考，例如《合一教理》，其實是相當深奧的，原文是德文，我們用英文本翻譯，都可以賣得二、三千本。漸漸地，靈修書的印量減少了，慢慢由三千變二千，再減到一千。一千這個數字是最基本的，因為若連一千本都印不到，便拿不到翻譯權，而且印刷也不划算。因此，由這個數字可見閱讀的趨勢，以書本形式的閱讀是減少了很多。

現在要出書不是不能，不過要有些特別吸引人的地方，或是有基本需要的。例如《天主教教理》，是一定要出的，雖然在網上也可以閱讀，但為有些經常要查看的人來說，可能一本實體書是比較方便。《香港天主教手冊》是要做的，是我們教會的教區資料；《教友禮儀記事手冊》雖然可以是不需要的，但有些人仍然傾向有一本，手冊裡有些是教友基本要知道的東西，一本齊全的書便很方便。現在有由幼稚園到中三基本的宗教教材，由教理、教育委員會編寫，我們都一樣是負責印刷。

在剩下來的時間，我們出版過小型書籍：有關祈禱的；有些介紹特別人物的精神，如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、教宗本篤十六世、德蘭修女等；有些特別的修會人物，如米蘭會、耶穌小姊妹等，這切合修會的需要。因此，我們都仍然可以做這些工作。至於純粹談靈修的書籍，合適而又有銷路的，真是比較難選擇。

其實在教區不單只有我們的（這出版的單位），還有幾個修會，及其他單位，甚至教友組織，他們很多都有做出版工作。香港這樣一個城市，中文書籍已經不是容易推

銷的，教會信仰文字的閱眾更狹窄。所以，有這麼多單位在做，我們實在不能全方位去做，我們只能找合適我們的，而我們人手又應付到的才去做。

李神父認為教友成立自辦的出版社或書店等是相當好的，有多些人便有多些的角度。況且，教友的知識水平已日漸提高，有不少教友讀過神學，可視之為一種實力。

藉文字滋養人靈

李神父在比利時讀書的頭一年，開始撰寫文章，不過第二年感得太辛苦便停了。至八十年代中，他得到夏其龍神父的邀請，為《公教報》寫專欄，開始恆常地寫作。

進修回來後，很多時會去修會主持大、小避靜，看書多了，講話多了。我一直都有閱讀的習慣，早期較多看中國文化的書，後來較少。也有看其他參考書和期刊，關於《聖經》、靈修和教義的，我一直都有參考閱讀，間中有些書需要精讀，由頭看到尾，慢慢思考。

後來夏神父做了《公教報》總編輯，他說：「你有機會接觸這麼多書本，你又喜歡中國文學，為甚麼不寫點東西呢？」他挑戰我，說每星期給我一個專欄。在兩年裡，我寫了差不多一百篇，當時覺得這是我所能貢獻的，那之後就沒有再寫《公教報》專欄了。

在 1985 至 87 年間，李神父先後以「如九曲」和「靈修漫談」的專欄名稱撰文，後來由於與美國的李定豪神父相熟，開始為三藩市以及美國其他地區的華人教友寫文章。《公教報》的專欄文章後來結集成書，接著李神父陸續出版一些口袋大小的書本，方便人們乘車時也可以拿著閱讀。

其中有一本書，成書因緣是因為我每個星期都與聖母軍開會，會預備一篇短短的神師訓話。每隔一段時間便拿回口述筆錄的神師訓話，間中寫得比較好、比較工整的，我會拿來看看是否表達出原來的意思，以及文字上有沒有要補漏的地方，之後便去結集。這樣由那兩年內大概選二十篇認為較有意思的，輯錄成一本靈修性的書，是短短的講話。

以後的，我多數寫長的文章，寫去美國的，刊於三藩市的華人通訊裡，一年大概四至五篇，兩年便可以輯錄十篇，加起來有幾萬字。另外再挑出二十篇左右的每周講話，加起來大概有一百頁的小冊。這樣便出版了幾本這些書，至2013年，大概兩年一本，加起來約有七、八冊。

除了公教真理學會的工作，李神父也常應堂區或修會的邀請，去帶避靜或主持講座，從事一些直接與人接觸的牧民工作。回顧達半個世紀的鐸職生涯，李神父自覺與一般在堂區從事牧民的神父並無兩樣。

回到堂區都是一樣的，只是堂區神父在主位，我們做配合。若我們講的道理適合教友，他們也很喜歡叫我去堂區，協助他們開彌撒。其實大家在意識上並沒大分別，只不過我們把更多時間放在文字之上。

胡樞機年代的堂區領袖

—— 沈禮訓

- 1947 年 出生於香港
1973 年 領洗於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
1991 年 任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首屆堂區牧民議會會長
1995 年 獲委任為教區教友培育委員會委員
2013 年 退休



(圖：沈禮訓先生，攝於 2018 年)

訪問、撰文：黃奕清

沈禮訓成長於沒有宗教信仰的家庭，踏入職場後才認識信仰和皈依。他在領洗後有一段時間，純粹是「主日教友」，直至定居大埔才開始活躍於堂區。他積極投入堂區事務之時，適逢胡振中樞機發表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牧函，從教友的角度，見證教會發展的一個重要時代。

當年沈先生甚至選擇辭去工作，經營小生意，好讓自己騰出更多的時間為堂區服務，期間亦不斷為著信仰成長及教友職務而持續進修。在沈先生的言談間，感覺堂區就是他的第二個家，他不但關心當中的人和事，更深入思考這個「家」的發展。

拜神家庭中的天主教徒

我自己本身家裡不是公教家庭，傳統拜神的。我是出來工作之後，有同事介紹了一本書給我，就是《中華殉道諸聖》的一本小書。當時看完之後感覺到很觸動，想到為何他們這一群人，會有如此大的勇氣呢？被它吸引了。後來朋友給我看另外一本書，一下子忘記那本是甚麼書了，但同時對天主教加深了認識。然後，他問我有沒有興趣進一步認識天主教會。我說「好」。

那時我在香港那邊住，在主教座堂那邊慕道。那時明愛大廈都未蓋起來，我們坐在主教座堂旁邊的公園，那範圍是主教座堂的，是一個公園，裡面有些鼓凳給人坐的。當時給我慕道的，是曾慶霖神父。¹

當時有幾個人一起，五、六個人左右。慕道完，我1973年在主教座堂領洗，是徐誠斌主教幫我領洗。領洗之

¹ 曾慶霖神父（1934-1991）在廣東出生，1962年在香港晉鐸，1964-81年間先後任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助理司鐸及主任司鐸，自1985年開始擔任新界區主教代表，直至逝世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網頁，〈曾慶霖神父〉：<https://bit.ly/2VSWA3M>。

後，我沒參加教會的活動，純粹領洗，不過都一直保持跟曾神父聯絡。

沈先生的父母對於他的宗教信仰相當開放，但由於他們與很多教外人一樣，也有跟從一些習俗，當中難免有點顧慮。

例如，我媽媽過身的時候，都是做傳統的儀式，為他們來說，當中有甚麼意義，他們都不大知道，別人說怎樣做就怎樣做。他們說：「你是長子，阿媽過身，擔幡買水²的工作，是你做的。」當時為我來說很掙扎，我怎可以這樣做呢？

然後，我去找曾神父討論這個問題。他說：「當中有些事，如果有其他人幫忙做，就給其他人幫忙做。如果真的沒有，需要你去做，沒關係的，你照做，你是為家庭去做，並不是相信，便沒有問題。你做完之後，回來辦一次妥善的告解，就妥當了。」

為我來說這是一個好大的鼓勵。這個概念，到我後期在慕道班，我去面對慕道者談論這些問題的時候，我都是用同一的態度，是相當好的。

梵二後的新舊交匯

六十年代中的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（梵二），為普世教會帶來翻天覆地的革新。沈先生領洗於梵二之後，除了禮儀本地化，他印象更深的，是福傳方式及平信徒參與上的轉變。

² 「擔幡買水」是道教葬禮儀式，古時孝子在河流旁放下買路錢，領水回家為亡者淋浴更衣。現今形式上由長子手執代表亡父或亡母靈魂的白幡「買水」，然後用買回來的水沾濕毛巾，在亡者臉上輕掃三遍，喻意洗淨靈魂，早登仙境。

73 年那時，剛好是梵二改革之後，在教會內，有些東西有新有舊。新的東西，不是很多人認識，但亦方便了，因為是中文彌撒，本地化。但是相對很多習慣了舊一套的，他又覺得舊的好，即是在那段時間有點矛盾。

在那段時間，我們算是新，反而舊的，我們不熟，但是很多祭台都是舊的，未改的。在禮儀方面，其實轉變相當大，到今時今日，分別是更大。

在梵二改革之前，特別在福傳方面，好集中在牧職，神父或者修女，在那時教友的參與性不是太高，傳道員的數量本身不多。

修會的傳道方式，跟神父又會很不同。我們覺得神父傳道，神父 nice（親切）好多，修女可能有修會背景，會是嚴肅的，「揸得好緊」³ 的，即使是禮儀改革、梵二之後，她們有一些方式和習慣，都未改過來。因為改革，無論教會與牧職，他們都要學習，所以很多是未曾改過來。

我小時候，家住一層樓，我們有分租給其他人，好像《七十二家房客》⁴，當然沒那麼多。其中有一房是天主教徒，他們全家都是教友。那段時間，是五幾年，很多時有修女去探他們，所以我那時已經有初步的接觸，但不認識。給我的印象是，「不可以拜神的」、「不可以有神主牌的」、「那些要丟掉的」，即是她們會用這樣的表達。

我相信，那時候的天主教徒，都是在接受這些，但是為一些外教徒，他們不知道，不明白，為何連祖先都要丟

³ 廣東話，形容對原則的把持。

⁴ 1973 年的一部電影，講述一幢舊式唐樓裡住著的七十二戶人家，反映當時小市民的生活。

棄，當時我小時候是有這樣的想法。到後來，我領洗之後，斷斷續續都聽到一些人會說，修女說不可以的，那些拜神的東西一定要丟掉。其後，慢慢做法一直在改，那可能是修會本身的培育，已經做了很多功夫，所以有所轉變。

植根大埔堂區

領洗後，沈先生甚少參與教會活動，加上搬了好幾次家，對堂區亦不熟悉。直到 1984 年，他搬到大埔，才從此植根：「特別是信仰的植根，在大埔。」

那時大埔區開始發展，所以很多的屋邨成立，多了很多人搬來，聖母軍、修女、神父都會去做家訪。當時我被聖母軍的一位姊妹，大家都是街坊，都住在宏福苑，被她「執返」⁵。她說：「返聖堂參加服務吧。」

那時我一直在基督教青年會 (YMCA) 做義工，工作相當忙，及至我在青年會服務了廿五年，拿了廿五年的「老人牌」⁶之後便結束了。我返回大埔，開始參與堂區的服務，最簡單的開始，就是服務組，幫忙做點工作。後來堂區的發展，特別在 1989 年左右。因為胡振中樞機 1989 年五旬節頒布了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牧函。

邁向光輝的十年·煥然一新的年代

胡振中樞機，我是屬於他的那個年代，因為自己參與了堂區的服務，同時亦留意到教會內的工作。

⁵ 帶回教會的意思。

⁶ 長期服務的紀念品。

給我最深刻印象的，是剛才所說的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，胡樞機為教會定下七個大方向去發展。當時我覺得，實在是煥然一新。那七個範疇，為我們教會是照顧到好多方面，在那些範疇內各司己職，我覺得是很全面。

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論及香港教區未來的牧民承擔，定下十年的工作方向和目標。牧函所論及的七個牧民及傳福音範疇是：

1. 教友培育
2. 信仰小團體
3. 司鐸、修士與修女的持續培育
4. 大眾傳播
5. 教育
6. 社會事務
7. 教區與中國及與中國教會的關係

教區於 1994 年進行檢討，翌年發表題為「傳揚福音，拓展天國」的中期報告及計劃書，總結五年實踐經驗之同時，勾勒另一個五年的宏觀路向。

在那段時間，我們在堂區發展基基團⁷，發展關社組，關社組應該是 90、91 年左右，基基團就早一點點。及至堂區議會開始成立，之前是沒有的，只是有一些教友的組織，跟神父大家做交流，未有正式的議會。

在那時，堂區如果沒有牧民議會，就是由牧職團管理。我個人覺得，在那時，胡樞機都看到，聖職人員開始老化，人數也少，所以希望能夠有多一點教友參與多一點

⁷ 基層基督徒團體的簡稱。香港天主教會亦稱它為「信仰小團體」，是教會最基層的組織，可在家庭層次或在相似的局限場所，相聚在一起祈禱、閱讀《聖經》、學習教理、討論人和教會的問題等。他們保持與堂區團體的結合，成為基督徒生活的酵母，照顧貧窮者和被忽視者，並致力於社會的改變。

職務。正如他提及牧職人員在堂區裡，要重點放在牧民工作，意思是，其他的行政工作容許教友去承擔職務。方向是這樣。另一方面，教友本身的條件和他所接受的培育，是否能夠承擔，以及是否正確地走那條路，這是一個問題。

我們要有議會，那就要有會章，我們著手在90年初左右草擬堂區議會的會章，給教區李亮神父審閱。獲批之後，我們也通過正式成立堂區牧民議會，我在那時便順理成章的擔當了會長一職。91年開始，我前後做了兩屆，由91年至95年，然後「落莊」⁸。

由90年開始，原則上，每個堂區都須要成立牧民議會，當時是由教友總會幫忙組織，所以由那時開始，每個堂區都有牧民議會。所有堂區的會長都有定期聚會，做交流。

在那時，教區仍未設立總鐸區⁹，到後來設立了，我忘記了是七個還是九個。每個堂區自己有堂區議會，定期一起到教友總會聚會、組織、做交流。後來再細分一點，每個鐸區自己組織，包括牧民議會，關社組都是。

以沈先生的觀察，大埔堂區自開始以來，長期由宗座外方傳教會會士負責，因此在牧民方向上的變化並不大。他看到當時的改變主要發生在教友層面，特別是教友在職務上的參與增加了。

⁸ 即卸任。

⁹ 堂區之上的單位，由數個在相同地域的堂區組成，以促進彼此間的交流溝通及牧民和傳教工作上的合作。香港教區現行的總鐸區制度由胡振中樞機於1992年引進；在1993年，教區劃分為九個總鐸區。

以前全靠神父說了算，神父說要做甚麼就做甚麼。堂區發展，一直長大的時候，特別是教友本身的質素條件不斷提升，以前的一套漸漸行不通了。其實在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胡樞機都很強調這一點，所以那時特別提我們要進行改革，這都是一個重點。

教友參與的人數多了，他們本身的質素都愈來愈高。以前讀上大學有多少人？現在一個招牌掉下來，都不知砸死幾多個。這是一件好事，同樣為他們，我們要做好培育領袖的角色。我有幸在初步發展的時候，在各方面都有參與，包括培育。那時我們都不斷去增值，這為我自己來說是很大的得著，為自己的信仰生活是很大的支持。

教友延續培育的需要

「落莊」之後，胡樞機改組了教友培育委員會，我有幸被邀請加入做委員。在培育委員會都做了兩任。返回堂區時，自己思考，由堂區議會到教友培育委員會這段時間，檢視自己做了甚麼，以及思考自己想做甚麼。

自己審視過所有資料之後，還是想回到最基層，做教友培育。因為自己一直覺得，教會內教友的延續培育相對做得比較少，教友在教會內的參與性不是太高，我覺得在持續培育上，可以做多一點點。如果在教區層面，就太闊了，不如在自己堂區。

在過程中，感覺到自己有很多不足之處，能力有限，特別是開始參與慕道班服務，起初是做陪談員，然後自己要去增值，去參與教理中心的教理班，完成了兩年教理班課程。讀完後覺得更加不足，就去報讀聖經學院。因為要

上班，沒有這麼多時間做功課，我說，不要這麼貪心，讀普及課程就好了，不用做功課，輕鬆點，以及放工去讀，可以的。那就讀了四年普及課程。

讀完之後，覺得仍有問題，剛好羅國輝神父說，不如參加我們的禮節師課程。我說好，我這兒剛剛讀完，反正預留了時間讀書，就去參加了教區禮儀委員會舉辦的禮節師課程，又讀了兩年。

我在堂區牧民議會發展過程當中，也看到了一些問題，就是很多有熱誠的教友，很熱心的教友，他們參與堂區的服務。第一點，他們抱有一份心態是，「做義工啫」¹⁰。第二點是，他們很多時會用自己的工作經驗，放進堂區。這兩方面，為我來說都是出現很大問題。

第一點，我跟他們說，返教會服務，不是義工，而是盡教友職務。第二點，如果我們把屬世的方式去處理屬靈的事務，是很容易會出現很大問題，很多時在過程中，將教會訓導推到一邊。這樣的話，我們的教會還是教會嗎？特別在牧民議會內，我們推行堂區工作的時候，方向會有落差的。這又牽涉到教友本身培育的問題，如果有足夠的培育，他們的定位和方向，能夠跟他們的熱忱相配合，那就很好了。但是為堂區來說，這是很奢侈。

走到 2018 年 · 再思堂區的發展

沈先生強調教友的培育，尤其是持續培育的重要性；而已經退休的他，在大埔堂區除了繼續參與堂區慕道團和善別小組等服務，亦不倦地思索堂區的發展。

¹⁰ 即「只是做義工而已」。

在胡振中樞機的年代，我很欣賞胡樞機的是，他「好叻」，我個人認為他有兩個左右手，一個文、一個武，陳日君助理主教（現為榮休樞機主教）我視他為武，湯漢輔理主教（現為榮休樞機主教）是文，教會兩方面的發展會比較均衡的。

那天跟你通完電話，反思這些問題的時候，再將一些舊資料拿出來看。特別我說我是胡樞機的年代，重看胡樞機的文件，所做的工作。當我翻開胡樞機那份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中期報告，那七大範疇，我就去反思，來到今年2018，在這七大範疇裡面，我們有多少範疇還在做，或者有沒有那些範疇，我們已經不提了，或者做少了。我自己一直在打分數。其實得分相當低，為我自己來說，都算是氣餒。

幸好我本身是傳道員，我在這方面掌握到《聖經》和教會訓導的訊息，這方面為我來說是一個支持，即是沒那麼容易迷失，因為始終我要跟人講，跟人溝通。特別講中期報告裡面，來到今天我還有一個想法，希望遲些能有機會跟堂區神父討論一下。

眼看很多家庭搬進搬出，議會的人事變動，牧職的人事變動，我慶幸能夠在這裡，都做一點點的工作，希望能夠繼續成為這個大家庭中的一個角色。

守護聖堂、以聖言拓天國

—— 溫以政神父

- 1930年3月24日 出生於廣東省揭西小坡洋村
- 1946年 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
- 1949年9月 因戰亂來港加入西貢小修院
- 1960年7月2日 晉鐸，其後前往馬來西亞服務
- 1975年 正式回港，在長沙灣基督君王堂任副本堂
- 1978年 轉任大埔堂副本堂，負責修葺偏遠離島教堂成為朝聖景點
- 1989年 成立之「聖言生活會」
- 2010年 聖言生活會更名為「以政聖言生活會」，正式成為教區認可的信友善會



(圖：溫以政神父，攝於2018年)

訪問、撰文：張小蘭

溫以政神父於 1930 年 3 月 24 日出生於廣東省汕頭教區揭西小坡洋村。1946 年 9 月，在十六歲半之齡進入揭陽聖伯多祿小修院。與同年代的很多修道人一樣，溫神父認為自己的修道之路，平凡不過。

我當初是去潮州那邊讀書，在那裡兩個月後回家，我父親問我：「本堂陳神父問你入修院讀書好不好？」我問入修院做甚麼？他說：「就是讀書！」我心裡想去遠一點的潮州府讀書和去近一點的揭陽讀都一樣，那當然去近的地方讀書。進了修院才知道修院的規則，慢慢便有了聖召。

拓展天國回報主恩

這個選擇也開啟了他幾十年的鐸職生涯。在訪談過程中，溫神父亦不時提到他的鐸職使命，就是「傳揚福音，拓展天國」。

我從來沒想過（離開修道生活）。我只是知道天主給我這麼大的恩惠讓我做神父，不是我有本事，而是天主白白賜給我的，便盡力去做。

因為那個年代又有共產黨，訓練我們這些神職人員的人材不夠，所以我們一生都是平平凡凡地過去的。既然天主恩賜我做神父，我便要盡力去做這個傳福音擴展天國的目標，我只是想到這一點，沒有想其他，即是與教友一起工作。

這位小修生其後被送到毗鄰梅縣教區的聖若瑟中學繼續學業。1949 年 9 月因為戰亂，到了香港由本地人打理的西貢聖神小修院，後再進入當時由耶穌會外籍會士管理的華南總修院（即現今香港仔的聖神修院）。雖然他只是修生，但耶穌會士很開放，讓他出去接觸難民。

我每個星期六都到修院以外的難民區教他們道理，有十幾二十個人在修院裡領了洗。他們是從大陸來香港，做一些雜役。

可能因著溫神父的探訪，讓這些難民感覺到有人關心，而沒有對西方傳入的宗教存有疑慮。

我也不知道他們為甚麼想進天主教，只是我們一直探望他們，相熟之後，我問他們有沒有意思入教，他們說：「有啊」。我問我來教道理好不好。他們說：「好啊，我們一家向你學習道理吧！」

他們多數沒甚麼知識，沒有讀過甚麼書，所以你講甚麼，他們便信甚麼。他們很純樸。沒有問甚麼問題。現在傳教反而難很多，有很多問題。

這些難民後來成為了香港仔聖伯多祿教堂的教友，但仍與溫神父保持聯繫。即使他調派到其他堂區，也經常去拜訪他。

吉隆坡發展聖母軍

溫神父於 1960 年 7 月 2 日由白英奇主教祝聖晉鐸。雖然在香港完成修院課程，由於他屬於汕頭教區，香港教區不能批准他的祝聖。

白英奇主教是在汕尾的，我不認識他，因為我屬於汕頭教區，他是香港教區的。我升神父時就去了馬來西亞吉隆坡教區，因為汕頭教區沒有主教，不能批准我升神父。

我們修院一般都直接問香港教區，一定要由院長出面，但可能修院沒有問，耶穌會與吉隆坡教區又有感情，所以院長問了吉隆坡的溫德隆主教（Dominic Aloysius

Vendargon)，是印度裔的。他就批准了，但要我去那裡工作。

吉隆坡政府不准我在那裡太久，只准留十年。後來當時主教要求內政部多批准我待幾年，所以我待在那裡十五年。要走的時候便回到香港來。

在吉隆坡十五年間，溫神父大力發展聖母軍，由起初的兩個支團發展到十一個，並且建立了普世之后區團，即一個集合了多個支團的地區性上層組織。

我在吉隆坡耶穌聖心堂三年，之後去了森蘭美州，即芙蓉，在那裡四年，也是副本堂，不過同時負責聖母軍。

我在那裡成立聖母軍的目的是傳福音和擴展天國，現在交給他們自己負責了。我離開那時有十一個，現在十四、十五個支團了，發展得很好。有了這個區團，我現在不在那裡，這個區團便繼續我的工作。

其實，溫神父在吉隆坡不單負責堂區，也服務麻風病院。

在堂區做了八年，之後去了蒙福那裡做了神師。我們附近有個麻風病院，我常常負責他們的主日彌撒，又和他們一起吃飯。他們做飯，我們一起吃，與他們打好關係。現在聽說那個麻風院已經沒了，本來住了三千多人，全都是有麻風的，而我們教友也有一百多人。

溫神父於 1975 年 5 月返港，正式回歸香港教區，起先在長沙灣基督君王堂¹擔任副本堂，於 1977 再調派到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服務，

¹ 1970 年，時任香港教區主教徐誠斌依教會法制成立「長沙灣基督君王堂」，以長沙灣天主教中學為堂區辦事處。至 1999 年為配合牧民需要，教區經諮詢後，將基督君王堂區納入現存的「聖老楞佐堂區」。

直至 1997 年 4 月。

離島偏遠堂區的守護者

溫神父對香港教區有一個重大貢獻，可能不太為人知道，就是受胡振中樞機所托，完整保管幾座離島小聖堂。

我在長沙灣兩年多三年，然後就去大埔。大埔就有複雜的工作，要管理吐露港六、七個教堂的工作。胡樞機希望我們保管堂區的完整，因為那時香港九七要回歸中國，政府說如果沒有教友，教堂空了便會收回。但胡樞機說不好啊，要保留給我們自己用，不要弄丟了。

用了差不多十幾二十年，在那裡修葺堂區作為朝聖景點。九七之後香港成為特區，便說特區成立之前，屬於教區的那些地方，九七之後不會動我們所管轄的地方。

這些偏遠離島教堂分別是深涌三王來朝小堂、赤徑聖家小堂、大浪聖母無原罪小堂，蜆家灣聖伯多祿小堂和東平洲耶穌聖心小堂，其中歷史最悠久的莫過於赤徑聖家小堂，早於 1866 年已有神父傳教，而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大浪灣的黃金時期。

最多的時候有五百多鄉民教友，有兩位神父負責在那裡做本堂，一位劉神父（劉榮耀）和曾子光神父²，劉神父在赤徑那裡，是本堂神父的住宿。

我不是長期坐在那裡，一星期去兩次，每個地方留宿一個晚上，兩天在那裡。深涌、赤徑、大浪西灣、蜆家

² 曾子光神父（1908-1984）出生於廣東寶安縣，1944 年在香港晉鐸。曾神父在戰後多年間，積極地在新界地區從事牧民工作。參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檔案處」網頁〈曾子光神父〉：<https://bit.ly/2vbhZti>。

灣、東平洲，這些都是我管的。我到每個地方都去看看能怎樣照顧那些教堂。

由於交通不便，通訊、教育都有困難，這些村落的不少居民都已外遷。在 1996 年的人口普查，大浪灣只剩下不足十四人居住。當時港英政府陸續收回無人居住的荒廢土地。

那些教友知道那裡教育不方便，全都搬走了，有些搬到市區，有些去了新界區，有些去加拿大、美國、荷蘭，搬到外國了，那裡只剩下一些鄉民，大的地區也只十幾個人。我去的時候差不多全走光了，只剩下幾個，有四五個來參加彌撒，沒有太多人了。

東平洲那個保不住了，因為政府聽到那些鄉民完全搬走了，只是星期六、日回去做生意。政府跟我們說：「你們現在沒有教友在這裡住了，那個聖堂沒有用了，應該交回。」便給政府收了。其他地方還好能保存，保住了教會的物業。

據《公教報》引述研究香港教會歷史的田英傑神父 (Sergio Ticozzi, PIME) 稱，東平洲鄰近中國大陸，不少偷渡者從水路到該處著陸，造成治安問題，加上交通不便，村民逐漸遷走，聖堂亦只運作十餘年便告荒廢。

以政聖言生活會

從內地來港的溫神父，一直心懷祖國。2010 年，在教友協助下，他正式成立教區認可的公教信徒善會「以政聖言生活會」。這個善會的宗旨之一，是藉著到國內朝聖建立與中國教會共融的信仰團體。

實際上，溫神父早於 1989 年 12 月成立「聖言生活會」，主動回應胡振中樞機發表的《邁向光輝的十年》牧函中有關教宗若望保祿二世

的號召，邀請香港教區擔任橋樑教會角色，推動中國教會內不同團體的共融合一，並協助建立了三十多座聖堂。

為甚麼會建立這個會，是因為胡樞機在78年說香港教區要走的路線是信仰團體，89年他出了牧函，說要落實信仰團體。我聽從胡樞機的推動，便在89年開始了聖言生活會。

我覺得教區推動信仰性團體只是分享福音，對自己靈修的修養會好一點，但不是落實傳福音擴展天國。胡樞機有一句話，說要傳福音擴展天國，我覺得香港教區的信仰小團體不能單單只看福音，分享福音，分享教友生活便算了，要腳踏實地去進行，要腳踏實地進行便需要一些組織。

這個有定期聚會及活動的團體，順著教區會議決定將信仰小團體設定為優先處理項目，也努力朝著小團體的方向邁進，於2009年把五十二個堂區的小組集合，成立聯會，統稱為「以政聖言生活會」。

如今退休寄宿於九龍灣聖若瑟堂的溫神父，除了繼續在主日主禮彌撒和平日與其他神父共祭，仍與以政聖言生活會一群教友維繫團體的力量，每年舉行例會、六次茶聚，以及三至四次的朝聖旅行。

我看到單單一個小團體是不夠的，那我們再組織了一個叫以政聖言生活會，這包括了香港教區五十二個堂區。我們用甚麼方式去聚集他們呢？我們有一個主意，叫福傳旅遊，目標是傳福音、擴展天國，我們把旅遊中捐獻所得的錢用來探訪聖堂，給他們用來作經費。

我們是集體出錢的，我們每樣都有，茶聚也有收奉獻，春夏秋冬，收到的奉獻都寫下。每年會發出一份綜合報告，從90年開始，注明年捐與月捐。捐錢的人每年都會

拿到這報告，即使你只捐了一百元也好，我們也會給你的，讓你知道收入和錢怎樣用。他們給我們的每一分錢都是作福傳用的，沒有自己拿去花了。

我始終都想到，我們本地的教會也是應該受照顧的，馬來西亞政府不讓我在那裡住那麼久，我也很高興能回來，為自己祖國出一分力是很有需要的。從我成立聖言生活會起，從 1991 年到 2010 年，我為大陸贊助了三十多間聖堂，讓他們有地方集中一起祈禱。他們說沒有聖堂傳不了教，我覺得也是對的。我能給多少便給多少吧，不能說我能悉數幫忙，但也只能這樣了。

查字典認識香港的傳教士

—— 馬偉良神父

(Fr. Patrick Masschelein, CICM)

- 1947 年 出生於比利時
- 1973 年 晉鐸
- 1974 年 到香港，於新亞書院學習廣東話
- 1977 年 服務於調景嶺聖母升天堂（至 1996 年）
- 1993 年 任將軍澳聖安德肋堂首主任司鐸
- 1998 年 任聖母聖心會省會長
- 2005 年 任紅磡聖母堂主任司鐸
- 2005 年 獲比利時國王頒授勳章，表揚其傳教工作



（圖：馬神父於 2019 年 2 月 24 日新春團拜活動講話。圖片來源：紅磡聖母堂網站）

訪問、撰文：黃奕清

馬偉良神父來香港已四十多年，期間除了有六年擔任聖母聖心會省會長，他都在堂區服務。但他服務過的堂區並不多，因為單在調景嶺就度過了二十年，他陪伴該區教友，直到調景嶺被拆去。而在調景嶺服務的後期，他同時要兼顧籌備將軍澳的新堂區；神父透露了籌建聖安德肋堂時一件鮮為人知的往事。

願往最需要他的地方

馬神父出生於比利時一個虔誠的教友家庭，自小參加童軍、輔祭會等很多堂區活動，讓中學時期的他已有當神父的念頭。馬神父在中學畢業後（十九歲）進修院，而為著要進教區還是修會的修院，他考慮過一段時間。

那時我鄉下的神父給我看，全世界有很多地方不夠神父，所以便慢慢向這個方向，去聖母聖心會的修院申請，那兒立即收了我。

在聖母聖心會的修院七年，一年初學院，兩年哲學，四年神學。最後兩年，聖母聖心會的會長問我：「你想去哪兒？」這個問題很難答，我不懂得答。那時未有電腦，未有上網，所以那時我答他，對亞洲比較有興趣。這是自己的興趣，我看書，時時都看跟亞洲有關的，尤其是中國的，對中國的歷史很有興趣，是個人的興趣，不懂解釋。那我跟他說：「亞洲，哪個國家最需要，我就去。」

過了一段時間，準備最後一年的神學，他（會長）說香港現在很需要，我答：「好！」然後我回自己的房間，我都不知香港在哪裡，無上網，無電腦，甚麼都沒有。我查字典，原來香港是中國的，英國的殖民地，我那時才開始看一看香港在哪裡。

「傳教，不懂得講就甚麼都做不到。」

對傳教士來說，第一步是學習語言；馬神父就在這方面下了不少苦功，也碰過釘子。他的家鄉在比利時南部近法國，以法文為母語。馬神父得知將要到一個英屬殖民地傳教，想到在香港會有很多人講英文，所以晉鐸後首先到愛爾蘭學習英語，在當地生活了八個月。

在愛爾蘭住在一個家庭裡，跟家人一起生活，白天上學，晚上跟家人，即是「immersion（融入生活）」，由朝到晚都被迫要說英文，這是最好的方法。學英文之後，就到香港，1974年9月。

馬神父在香港的首三年，在紅磡聖母堂度過，先在新亞書院全職學習廣東話兩年，然後在聖母堂實習一年。他覺得這是天主很特別的安排，因為他所屬修會在香港的傳教工作，正是在那裡開始。

聖母聖心會在這裡開始，已經是六十年前，當時很多神父從中國大陸被趕出來，回比利時，有些經過香港，覺得這裡都屬於中國，想留在這裡，就向主教申請。那時的红磡甚麼都沒有，主教就說：「紅磡吧，你們在那裡做傳教工作」。這是六十年前的事了。買了這塊地，起了聖堂，起了學校，就開始建立堂區。

我第一天來到，還可以望到北角，過了幾星期後，就望不到了，因為起黃埔新邨。所以很有興趣，一邊學中文，一邊看他們如何起樓。

那時（新亞書院）在天光道，所以我每日步行到學校。學校後來搬去了中文大學，那時離這裡很近，所以我很方便。

學習廣東話不久的馬神父，當然常常會講錯說話。例如他想說很喜歡堂區，卻說成了「我好鍾意我的同居（堂區）」，令教友大為驚訝：「神父有同居嗎？」

差不多每一日都會講錯說話。我時常都跟他們說，如果我說錯話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我要學識，你不告訴我的話，我會繼續說錯，那我就沒進步，我說我要進步。

我很辛苦學廣東話，跟著到調景嶺，99%的人不講廣東話，用自己的鄉下話，所以是很困難。小朋友因為學校，所以講廣東話，我們在那兒辦三間學校；但是其他教友，全部都是講鄉下話，湖南、上海、四川……甚麼話都有。好困難，真的非常困難。

我講廣東話，他們聽得懂，他們說鄉下話，我不知他們說甚麼。他們辦告解，跟我說，我答「天主保佑」，聽不懂，很困難，那幾年真的很辛苦。

堂區有位義工，譬如我去探訪或者參加活動，會幫我翻譯。後來，忘了過了多少年，我返中文大學，學普通話，真的很需要。我在學校學很標準的普通話，但他們說的鄉下話，沒有人聽得懂的。嘩！真的很困難！

普通話在後來馬神父當聖母聖心會省會長的六年間，才真正大派用場，因為那段時間他常常要到台灣、新加坡和蒙古等地。

「以前去探人，是件很開心、很自然的事。」

語言的不同雖然引起了不少誤會和故事，卻無阻神父傳教的熱忱，也無礙他與教友建立關係，尤其是在調景嶺生活的那二十年。

調景嶺這個社區始於 1950 年，港英政府把六千多名逃離國共內戰的難民集體遷移到調景嶺，他們中大多是國民黨軍人及家眷，故有「小

台灣」之稱。¹ 那時的調景嶺既偏僻又荒蕪，政府的救濟物資亦相當不足，包括天主教在內的基督宗教，遂成為難民物質以至精神上的重要支援。調景嶺好不容易由一個難民營，發展成為獨特的社區。²

同是難民的耀漢小兄弟會曹立珊神父³ 當年獲主教授命，首先隨難民遷到調景嶺生活，開闢荒地。⁴ 隨後聖母聖心傳教修女會於 1953 年在調景嶺開展牧民工作，聖母聖心會傳教士亦自 54 年開始在該區服務，⁵ 而聖母升天堂⁶ 則於 65 年 1 月祝聖啟用。

以前調景嶺是小鄉村，每個人都熟絡，只有幾千居民，所以晚上沒有人鎖門，我們下去，進去這裡、那裡坐，很開心的。他們對我很好，都很欣賞我去探他們。因為是小鄉村，跟市區不同；那兒沒有車，都是石級，在一個山頭，要行很多樓梯。

那份關係，好像小團體。教友不多，星期六晚那台彌撒很少人，星期日七點半和九點正，兩台彌撒也是不多人，所以在開彌撒方面，要做的事不多。

那些以前的軍人，以前國民黨，他們的家庭都在中國，所以都很掛念家人，我們常常去探他們。雖然語言溝

¹ 香港歷史：〈重拾調景嶺精神，不應只是夢想！〉·《輔仁媒體》，2014 年 8 月 21 日。

² 劉義章、計超：《孤島扁舟：見證大時代的調景嶺》（香港：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，2015），頁 2-19。

³ 曹立珊神父（1913-2011）原籍河北，晉鐸於 1935 年。他在 1949 年來到香港，翌年隨難民到調景嶺，開展救濟、教育及牧民的工作。曹神父自 1954 年在台灣服務，直至逝世。

⁴ 〈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〉·《公教報》，1996 年 07 月 19 日。

⁵ 〈聖母聖心會傳教歷程 服務弱小 體現一心一德〉·《公教報》，2018 年 04 月 01 日。

⁶ 聖母升天堂的前身是一個葵棚，後於 1979 年 7 月成為堂區，1996 年 1 月歸入聖安德肋堂，同年 7 月 7 日奉獻最後一台彌撒。參〈聖母升天堂結堂紀念特輯〉·《公教報》，1996 年 07 月 19 日；「天主教香港教區歷史建築探索」網頁，〈聖母升天堂〉：<https://bit.ly/2Xg4AFc>。

通困難，但他們都很欣賞，於是我們都能夠建立一個像大家庭般的氣氛。

甚至現在，清拆了二十年，我們還有個基基團，有繼續開會的，兩個月一次聚會，在教友的家中，有二十人左右。因為家庭的氣氛。很困難，但小團體，家庭的氣氛是很好的。

現任紅磡聖母堂主任司鐸的馬神父感嘆，現在想做社區探訪實在困難。

在這裡（紅磡），去那些大廈，想去探一個人，不讓我進入，要看身份證，很麻煩的。以前去探人，是件很開心、很自然的事。整個調景嶺的教友都知道，神父來了，我們周圍都去坐，「飲杯茶、傾下計」⁷，是不同的生活。在這裡，我隔離鄰舍都不認識，因為夜晚全部鎖門，不理其他人，晚上想去探訪都不知多困難。



（圖：馬偉良神父〔左一〕在聖母堂新春團拜活動中派紅包）

⁷ 廣東話，喝杯茶、聊聊天的意思。

「一個快要死的堂區，一個剛出世的新堂區」

在那個香港急速城市化的年代，有不少傳教士都成為了堂區的開荒牛，馬偉良神父亦是其中之一位。九十年代，政府逐步把將軍澳發展成為新市鎮，聖母升天堂所處的調景嶺寮屋區因而面臨清拆。

我忘了是否 1992 至 1997 那幾年，我負責兩件事：一個快要死的堂區，一個剛出世的新堂區。當時未有「聖安德肋」這名字，那時是「準堂區」，在景林天主教小學的禮堂舉行主日彌撒。

將軍澳第一台彌撒，是我做的，應該是 1990 年將臨期第一主日，我還記得，在景林天主教小學的禮堂，那時未有聖堂。我們開始辦手續，買地慢慢起聖堂，就是聖安德肋堂。

所以（那幾年）我在調景嶺開彌撒，然後行四百個石級上山，然後再乘車到將軍澳開彌撒。那幾年是很辛苦，因為調景嶺他們說「不要放棄，我們還在」，當然是有感情。將軍澳說「我們是新的，你常常回調景嶺，我們這裡新市鎮，愈來愈多人。」兩方面都爭取，我兩邊都要做。97 年調景嶺被清拆完，就集中精神在將軍澳。

馬神父憶述在籌建新堂期間，因遇上了阻滯，而發生了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。當年香港教區已物色了一塊地，準備工作做了好幾年，卻忽然收到房屋署來信，說那塊地不行，叫他們另覓新址。馬神父認為，政府大概是發覺到該地段剛好在地鐵站旁邊，很寶貴。

所有文件都準備好了，我們都守規矩，請則師，我們已經開了很多會，常常到教區跟康神父⁸開會，忽然間收

⁸ 康建璋神父，教區前任總務長，負責管理財務。

到信，嘩！有無攞錯呀！

我第一次，我開車上去港督府，找彭定康，他是教友。我進去了，駕著車，說我要找彭定康。彭定康見到我，我向他解釋，我們在這裡工作了起碼四、五年，突然間你們房屋署不給我們，怎可以這樣？「神父，放心，我負責。」一星期之後，房屋署來信說，對不起，有少少的誤會，就沒事，就繼續進行了。

「我的第一個優先，是探病人。」

馬神父在港多年的傳教生活中，一直都視探訪病人為優先的牧民工作。誰進了醫院，他就立刻去探望，像訪問的前一天他就去了一個病人家裡探訪。

探病人對我來說是很重要，耶穌行奇蹟，大部分都是為盲人、麻風病人、行動不便的人。我剛才都看福音，耶穌晚上想吃飯都沒時間吃，因為一群病人來找祂。

如果你看《天主教手冊》，伊利沙伯醫院是玫瑰堂負責的，但是現在他們常常叫我們去，因為他們知道我們一定會去。

近年，馬神父在堂區多了安排到中國內地的朝聖活動，他希望教友認識自己國家的傳教歷史。也許由於天主教是由歐洲傳來香港，香港教友們比較熱衷到羅馬、露德、花地瑪、默主哥耶等地朝聖。

馬神父感歎，教友對自己國家的傳教歷史不大關心。在這次訪談的兩星期前，他就帶了聖母堂的一些教友到內蒙古，了解聖母聖心會以前的神父在當地傳教的情形。

剛剛開聖若瑟會⁹，我問婆婆們：「你認識自己國家、你自己中國傳教的歷史嗎？」她們都不認識，花地瑪、默主哥耶就認識，中國大陸的就不認識，是否有點矛盾？講露德、花地瑪就會很吸引，講到內蒙，覺得「無嘢玩」¹⁰。我說：「對不起，我們不是去玩，我們去朝聖。」（參加了內蒙古朝聖團的）三十幾位教友，他們都開了眼界。

⁹ 聖母堂的聖若瑟會，主要在殯葬禮儀中為離世教友誦念玫瑰經和煉獄禱文，藉以表達對亡者及親友的關懷，亦希望能將基督的訊息傳給未信主的親友；會員亦有定期探訪年長病弱的教友。

¹⁰ 即沒甚麼好玩的。

教會的女性

